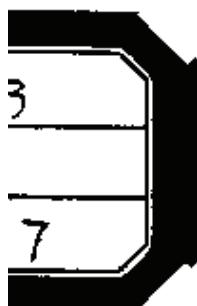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 問題的三篇文章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 問題的三篇文章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中共中央列寧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本书譯文采自“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2卷和第31卷，這次排印時，由譯者根據原文重新作了一次校訂。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三篇文章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56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字第112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字数32,000

1966年1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1·080 定价：四：0.12元

目 录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綱）	1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1
2. 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2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4
4. 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問題的革命提法	5
5. 民族問題中的馬克思主義和蒲魯东主义	6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8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9
8. 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10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对 自决的态度	11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15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会的報告（1920年7月26日）	22
注释	28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 紗)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資本发展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創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現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經濟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軍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須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沒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騙人的鬼話——的基础上同它們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終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

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2. 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行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比方说，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梦想”，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意义上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意义上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劳动货币或危机的消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不能实现，那是完全不对的。第二、即使只举 1905 年挪威和瑞典分离的例子，就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英国在今天或明天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波兰、印度等新国家的形成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四、金融资本竭力向外扩张，“自由”收买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以及任何一国、甚至“独立”国的被选出来的官吏。金

融資本的統治，也和一般資本的統治一样，并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灭的；而民族自決則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金融資本的这种統治，絲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这一階級压迫和階級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明显的形式的作用。因此，从經濟意义上來說，关于政治民主的一种要求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實現”的一切論斷，归結起来，就是在理論上对資本主义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断定。

在第二种場合，这种論斷是不全面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決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只是不完全地、殘缺地而且是以罕见的例外形式（如1905年挪威和瑞典的分离）“實現”的。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經過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實現”的。然而，社会民主党并不因此而拒絕为實現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絕这种斗争只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須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而要打破这个范围；不要滿足于議会中的发言和口头上的抗議，而要使群众积极地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剧爭取實現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直接进行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游行示威、饥民騷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并且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事件¹和薩比林事件²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在被压迫民族的分离問題上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

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并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爭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相反地，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就在这种基础上发生的冲

突，作为群众行动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³。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⁴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

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們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 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問題的革命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們最低民主綱領中的一切条文，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就已經由小資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資产阶级到现在还是空想地提出这一切条文，因为他們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加强，而相信“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拥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空想就是这样的。同这种市侩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綱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現象：民族已經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籠統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談去反对兼并和贊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別“不愉快的”問題，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問題，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該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說，要为自決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話，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間达到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們是閉口不談被“他們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們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須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組織

上的)團結。否則在資產階級各種詭計、背叛和欺騙下，就不能捍衛住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因為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經常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成欺騙工人的手段：在對內政策上，它利用這些口號去同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實行反動的妥協（如在奧地利和俄國的波兰人同反動勢力勾結起來，壓迫猶太人和烏克蘭人）；在對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競爭的帝國主義強國之一相勾結，來實現自己的掠奪目的（如巴爾干小國的政策等等）。

爭取民族自由、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在某種情況下可能被另一“大”國利用來達到它的同樣的帝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情況也很少能使社會民主黨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正像資產階級屢次利用共和主義口號來達到政治欺騙和金融掠奪的目的（如羅曼語各國），並不能使社會民主黨人拒絕自己的共和主義一樣^①。

5. 民族問題中的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

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馬克思認為一切民主要求，毫無例外，都不是絕對的東西，而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群眾反對封建制度的歷史表現。這些要求中的每一個要求都能成為並且在某種情況下已經成了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在這方面，把政治民主

① 不用說，如果認為從民族自決權中似乎會得出“保衛祖國”的結論，因而否認民族自決權，那是很可笑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在1914—1916年常常拿民主派的任何一個要求（如它的共和主義）和反對民族壓迫的主張，為“保衛祖國”辯護，這也是不值一駁的。馬克思主義承認歐洲某些戰爭中，例如，法國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戰爭中，保衛祖國的結論，而否定1914—1916年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的結論，都是從分析每次戰爭的具體歷史特點，而決不是從什麼“一般原則”和綱領中某一條文得出來的。

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拿来同其余的要求相对立，这在理論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际行动中，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爭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的斗争服从于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认”民族問題的蒲魯东分子相反，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終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⁵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則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⁶。正是从英国工人的革命斗争着想，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說：“即使分离以后建立联邦也好”⁷。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經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这样，馬克思才能駁斥資本辩护人的論調，他們大叫什么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不但經濟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而馬克思却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的理解来坚持这种集中的进步性的，他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国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只有这样，馬克思才能也在解决民族問題方面，拿群众的革命行动来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它所揭露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伪善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明显地证实了馬克思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

① 希腊神話中說，奧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來沒有打扫，后来被海格立斯在一日内扫清。意思是指极肮髒、极污臭的地方。——譯者注

种政策应当成为各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現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①。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分成三类主要国家：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像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②。

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里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才特别发展了起来，民族斗争才特别尖锐了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

① 有些人常常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承认民族自决的必要性，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连奇在“钟声”杂志（«Die Glocke»）8第8、9两期上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⁹。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② 在某些没有参加1914—1916年战争的小国中，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这就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用不正确的理由来拥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否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中表现了一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果特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和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別困难和特別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融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10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而有机会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任务。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也就是说，在那些把“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中间，在民族自决問題上有两种主要色彩。

一方面，我們看到，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僕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的进步性而赞成兼并，否认似乎是空想的、梦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自决权。属于这类人的，在德国有庫諾夫、帕尔烏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在英国有部分費边社分子和工联领袖；在俄国有机会主义者謝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維奇等。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諾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許多和平主义者，他們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統一，而在实践上和他們完全一致，他們拥护自决权純粹是口头上的

和虛假的，因為他們認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过分的”（“zu viel verlangt”，見 Kautsky 在 1915 年 5 月 21 日《Neue Zeit》^① 上所用的字眼），他們不堅持正是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採取革命的策略；相反地，却抹殺他們的革命义务，為他們的機會主義辯護，使他們易于欺騙人民，对于把沒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強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內的國家的疆界問題恰恰避而不談，等等。

这两類人同样都是機會主义者，他們出卖了馬克思主義，喪失了理解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說明的那种策略的理論上的意義和实践上的迫切性的任何能力。

至于其中讲到兼并，这个問題由于战争而來得特別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難相信，反对兼并的抗議，或者归結于承认民族自决，或者是基于主张維持 *status quo*（現狀）和敌視一切暴力、甚至革命暴力的和平主义的言詞。这种言詞根本是虛偽的，同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

8. 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刻不容緩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銀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資產阶级，特别是費邊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識分子，在这种时机一定会千方百計地打乱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有限的民主目的。如果說，在无产者开始冲击資產阶级政权基础的情况下，一切 純民主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都会起着阻碍革命的作用，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 一切 被压迫民族

① 考茨基在“新时代”上。——編者注

的自由(也就是它們的自決權)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正如 1848 年德國的或 1905 年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獲得勝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樣。

然而，爆發社會主義革命，也許還要經過五年、十年或者更多時間。今后提到日程上來的是要對群眾進行革命教育，使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無法留在工人政黨內，使他們不能取得 1914—1916 年那樣的勝利。社會主義者應當向群眾說明：如果英國社會主義者不要求各殖民地和愛爾蘭有分離的自由；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求殖民地、亞爾薩斯人、丹麥人和波蘭人有分離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傳和革命群眾行動也推廣到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方面去，不利用薩比林這樣的事件來在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中間進行最廣泛的秘密宣傳，來舉行遊行示威和組織革命群眾發動；俄國社會主義者不要求芬蘭、波蘭、烏克蘭等有分離的自由，如此等等，——這樣的社會主義者的行動，就是沙文主義者的行動，就是沾滿了血污的帝國主義君主派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走狗的行動。

9. 俄國社會民主黨和波蘭社會民主黨 以及第二國際對自決的態度

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在自決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早在 1903 年的代表大會上就表現出來了。這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並且不顧波蘭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抗議把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第 9 條列入了這個黨綱。此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從來沒有以黨的名義重新提議把第 9 條從我們黨綱中刪掉，或提議用其他某種說法來代替這一條。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57%，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1912年1月重新恢复的我们的党，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¹⁰，这项决议肯定了自决权，并且正是根据上述具体意义作了说明。1914—1916年，不论在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社会主义者（鲁巴諾維奇、普列汉諾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等等）中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都曾猖獗一时，这就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认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政府。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負任何責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民族問題立場的最新說法（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要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使波兰人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 把完整的国家重新分成几部分”……宣言斥责那些让霍亨索伦王朝担当……“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的社会主义者。它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来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异国统治的一切形式，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員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战争“对波兰人”是“双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1915年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2号第15页；俄譯文見“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頁）。

这些論点实质上同承认民族自決权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的政治措詞比第二国际大多数的綱領和決議更含糊不清。用确切的政治措詞来表达这些思想和确定它們适用于資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嘗試，都将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決是錯誤的。

1896年国际社会党人伦敦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決的決議，应当根据上述論点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別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內容；(3)必須分清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決是不彻底的，純粹是口头上的，因此从政治意义上來說是虛偽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坚持受“他們”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的；(6)必須使为爭取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資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的口吻去欺騙人民，結果使他們錯誤地否认自決)的观点搬到“国际”上来，是一个理論上的錯誤，是用蒲魯东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上，考茨基公开向最卑鄙龌龊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尔利茨伸出基督

徒的和解之手，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有被压迫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承认俄国的波兰有这种自由，是为了向兴登堡和威廉二世效犬马之劳。这是考茨基主义自己揭穿自己的再好不过的事实！

写于 1916 年 1—2 月

载于 1916 年 4 月“先驱”杂志第 2 期

1916 年 10 月用俄文刊于“社会民主党人
文集”第 1 卷

按“文集”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 22 卷第 137—150 页)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¹¹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以下的关于殖民地和民族問題的提綱草案，請同志們討論，并請全体同志，特別是具体了解这些复杂問題中的这个或那个問題的同志，以最簡短（至多三兩頁）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評論、修正、补充或具体說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奥地利的經驗。

波兰犹太和乌克兰的經驗。

亚尔薩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經驗。

东方各民族。

同大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里亚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坦。

土尔克斯坦及其經驗。

美国的黑人。

各殖民地。

中国——朝鮮——日本。

尼·列寧

1920年6月5日

1. 按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本性說來，關於一般平等問題，其中包括民族平等問題的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是資產階級民主制所特有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在一般個人平等的名義下，宣布有產者和無產者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來大大欺騙被壓迫階級。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產關係的反映，資產階級借口個人絕對平等，把這種思想變為反對消滅階級的鬥爭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義只能是要求消滅階級。

2.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的壓迫鬥爭的自覺的代表者，它根據自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和揭露其虛偽和偽善的基本任務，在民族問題上也不應當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則當作主要之點，而主要之點應當是：第一、準確地估計具體的歷史情況，首先是經濟情況；第二、把被壓迫階級、被剝削勞動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的總概念，即意味着統治階級的利益的總概念，明確地區分開來；第三、把被壓迫的附屬的、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同壓迫的、剝削的、享有充分權利的民族也明確地加以區分，來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相對立，這種虛偽性蒙蔽着金融資本時代和帝國主義時代所特有的現象，即為數無幾的最富強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絕大多數人實行殖民奴役和財政奴役。

3. 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面前，特別清楚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詞句的虛偽性，在事實上表明，標榜為“西方民主”的凡爾賽條約是比德國容克和德皇

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更加野蠻、更加卑劣地壓在弱小民族頭上的暴力。國際聯盟和協約國戰后的全部政策到處加強先進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附屬國的一切勞動群眾的革命鬥爭，使所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儈的民族幻想更快地破滅，從而更清楚更尖銳地揭露了這個真理。

4. 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結論：共产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為共同進行革命鬥爭、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而彼此接近起來。因為只有這種接近，才能保證战胜資本主義，如果沒有這一勝利，便不能消滅民族壓迫和不平等的現象。

5.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勢把無產階級專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變都必然圍繞著一個中心點，這個中心點就是世界資產階級反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必然要一方面團結各國先進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團結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民族根據自己的痛苦經驗，深信除了蘇維埃政權战胜世界帝國主義之外，他們別無生路。

6.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於空口承認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勞動者互相接近，必須實行使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一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蘇維埃俄國實現最密切的聯盟的政策，並且根據各國無產階級中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程度，或根據後面國家或後面民族中工人和農民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發展的程度，來確定這個聯盟的形式。

7. 聯邦制是各民族勞動者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無論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会主义共和國同其他蘇維埃共和國（過去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芬蘭蘇維埃共和國、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

国，現在的阿捷爾拜疆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中，或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部同从前既沒有成立國家又沒有實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里亞自治共和國，1920年建立的韃靼自治共和國)的關係中，聯邦制在實踐上已經顯示出它是適當的。

8. 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任務，是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用經驗來檢查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礎上所產生的這些新的聯邦制。既然承認聯邦制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那就必須力求達到愈來愈緊密的聯邦制同盟，第一、因為沒有各蘇維埃共和國最緊密的聯盟，便不能捍衛被軍事方面無比強大的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所包圍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生存；第二、因為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必須有一個緊密的經濟聯盟，否則便不能恢復被帝國主義所破壞了的生產力，便不能保證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為估計到，建立統一的、由各國無產階級按總計劃調整的完整的世界經濟的趨勢，這種趨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會繼續發展而臻于完善。

9. 在國家內部關係方面，共產國際的民族政策決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派那樣，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純粹宣言式地承認民族平等，在實踐上却不負任何責任，這些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管是坦率地承認自己是民主派，或者是像第二國際的社會黨人那樣，借社會黨人的稱號來掩飾自己，都是一樣的。

不僅在共產黨的全部宣傳鼓動工作（議會講壇上和議會講壇外的宣傳鼓動工作）中，應當不斷地揭發各資本主義國家違背自己的“民主”宪法，經常破壞民族平等，破壞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種種事實，而且還必須做到：第一、經常解釋，只有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

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立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像我们在第二国际政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須帮助这些国家的資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財政关系上所依賴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須同落后国家內具有影响的僧侶及其他反动的和中世紀式的分子作斗争；

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別作斗争；

第四、必須特別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現象或封建主义殘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間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聯盟；必須特別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維埃”等方法把苏維埃制度的基本原則应用到資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統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須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內的資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認識到同本国資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別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資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資产阶级民主派結成临时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絕對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国家、特別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說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貫进行的欺騙，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

方面都完全依賴于它們的國家；在目前國際形勢下，除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以外，附屬的和弱小的民族別無生路。

12. 帝國主義列強歷來對殖民地的和弱小的民族的壓迫，使被壓迫國家的勞動群眾不僅憎恨而且不信任整個壓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該民族中的無產階級。這一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正式領袖，在1914年至1919年曾經按照社會沙文主義的精神，借口“保衛祖國”來保衛“本國”資產階級壓迫殖民地和掠奪在財政上處於依賴地位的國家的“權利”，他們這種背叛社會主義的卑鄙行為不能不加重這種完全合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愈是落後，這個國家的小農業生產、宗法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厲害，而且這種情況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資產階級偏見，即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狹隘性特別厲害和頑固。既然這些偏見只有在各先進國家內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消滅以後，只有在落後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基礎急劇改變以後才能消逝，那這些偏見的消逝，就不能不是很緩慢的。因此，各國有覺悟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對於受壓迫最久的國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殘余要特別慎重，特別注意，同樣，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指出的不信任心理和偏見，必須作某種讓步。沒有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自願追求聯盟和統一的願望，战胜資本主義這一事業是不能順利完成的。

1920年6月發表

按手稿刊印，并根據列寧修改過的
清樣作過校訂

(選自“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
版社版第31卷第124—130頁)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委員會¹²的報告^①

(1920年7月26日)

同志們，我只預備作一个簡短的序言，然后，由我們委員會過去的秘书馬林同志向你們詳細地報告我們對提綱的修改。在他以後，补充提綱的起草人羅易同志也要發言。我們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修改后的提綱初稿和补充提綱。这样，我們在一切最重要問題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現在，我就來作几点簡短的說明。

第一、我們的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同第二國際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我們強調這種區別。在帝國主義時代，對於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來說，特別重要的是弄清具體的經濟事實；在解決一切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時，不要從抽象的原理出發，而要從具體的現實的各種現象出發。

我們看到，帝國主義的特點就是現在全世界已經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數甚少的、擁有巨量財富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壓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有

① 这是列寧在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次報告。譯者注

10亿以上，都是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大概是12亿5千万。我們把世界总人口算作17亿5千万，他們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們有些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关系中，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某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約而深深地陷于对該国的附属关系中。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貫穿着整个提綱，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綱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綱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綱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們提綱中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維埃运动和以苏維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維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們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哪怕这个問題談的是世界上某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強調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問題。正是这个問題引起了某些意見分歧。我們发生爭論的地方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應該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在原則上和理論上是否正确。討論的結果我們一致决定：不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說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話）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

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在委员会里有人反对說，要是我們說資產階級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間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經表現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資產階級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資產階級往往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数的場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妥协，也就是同他們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經无可辯駁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們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資產階級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們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說，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資產階級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們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應該反对改良主义資產階級，第二国际的英雄們也属于这种資產階級。在殖民地国家里已經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現在已經貫串在整个提綱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們的观点。

其次，我还想对农民苏維埃問題发表一点意見。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的殖民地里，在像土尔克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們提出过在資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問題，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資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統治地位，因此，还談不到純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們在那

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角色，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我們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們工作的实际結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問題、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願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歐各国的同志們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工作。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苏維埃組織的思想，并且在实际中很好地运用它。同样明显，那些不仅受商业資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是能够在本国的条件下运用这种武器和这种組織形式的。苏維埃組織的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們在这方面的經驗虽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員会里进行的有殖民地国家的几个代表参加的討論，完全无可辯駁地向我們证明，在共产国际的提綱中必須指出，农民苏維埃、被剥削者苏維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資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有資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并且指出，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无条件地應該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維埃、劳动者苏維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許的地方，他們就應該立即設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維埃。

現在，我們的实际工作中又出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領域。在这方面我們的一般經驗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們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苏維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們，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

关于这个問題，委員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綱，而且更多地对罗

易同志起草的提綱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討論（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作些說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綱的一些修正。

問題是这样提出的：对于目前正在爭取解放而战后已經有了进步表現的落后民族，国民經濟的資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說法究竟对不对。我們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們进行系統的宣传，而各國苏維埃政府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們，那末，說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資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們不仅應該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組織，不仅應該立即宣传組織农民苏維埃，設法使这种苏維埃适应資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應該指出，还應該从理論上說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須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預先指出。实际經驗會給我們启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說，最遙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对于苏維埃思想也是很亲切的，苏維埃这种組織一定能够适应資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應該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而且在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特别是在剝削民族用来控制它們的殖民地人民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

英國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們委員会里談到了这个問題。他說，普通的英國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國統治是叛变的行为。的确，有侵略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緒的英、美工人貴族对社会主义是最大的危险，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这就是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領袖和工人的最大叛变。第二

国际也討論过殖民地問題。在巴塞尔宣言上关于这个問題也說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的党也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們看不到第二国际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沒有看到它們援助被剥削和附属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大多数已經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們应当公开地說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駁倒的。我們要看看，有沒有人想來反駁。

这些看法就是我們決議的基础。无疑，这些決議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們毕竟是有用处的，它們將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开展和組織真正革命的工作，这也就是我們的主要任务。

(选自“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31卷第209—214頁)

注 释

- 1 德雷福斯案件 是法国反动的君主派軍閥集团于1894年对总參謀部軍官犹太人德雷福斯組織的挑拨性的审讯，誣告他进行間諜和叛国活动。軍事法庭把德雷福斯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法国展开了重申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共和派同君主派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1906年宣告无罪。
列宁把德雷福斯案件叫作“反动軍閥所进行的千百次黑暗勾当之一”。——第3頁。
- 2 薩比林事件 于1913年11月发生在阿尔薩斯的薩比林城。这个事件是由于普魯士軍官侮辱阿尔薩斯人引起的。当时激起了当地居民（大多是法国人）反对普魯士軍閥的压迫的怒潮。关于薩比林事件，見列寧的“薩比林”一文（“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514—516頁）。——第3頁。
- 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23卷第464、480頁。——第4頁。
- 4 关于对伦納和鮑威尔的所謂“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見列寧的“論‘民族文化’自治”（“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504—507頁），“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卷第1—35頁）以及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89—358頁）。——第4頁。
- 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卷第577頁。——第7頁。
- 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95頁〔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寧用的是“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爾的遺著”一书（弗兰茨·梅林編1902年斯图

加特版第3卷第108—114頁)，該书中这篇文章沒有标明作者。——譯者注]。——第7頁。

- 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23卷第464頁。——第7頁。
- 8 “鐘聲”杂志(«Die Glocke»)于1915—1925年先在慕尼黑以后在柏林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帕尔烏斯(海尔方德)出版，他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第8頁。
- 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322—342頁[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因为当时列宁用的是“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爾的遺著”一书(弗兰茨·梅林編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246—264頁)，該书中这篇文章沒有标明作者。——譯者注]。——第8頁。
- 10 列寧是指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由列寧起草，經有党的地方工作人員參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會會議通過。會議于1913年10月6—14日(新曆)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波罗宁村召开。为了保密起見，會議称为“夏季”或“八月”會議。決議案刊于“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426—428頁。——第12頁。
- 11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是列寧寄給當時在西南戰線的斯大林的。斯大林在1920年6月12日給列寧的信中提出自己对提綱的意見。提綱于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发表。——第15頁。
- 12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由以下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組成：俄国、保加利亚、法国、荷兰、德国、匈牙利、美国、英属印度、波斯、中国、朝鮮、英國等等。該委員會在列寧的領導下进行工作。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經代表大会第四和第五两次會議討論后，于7月28日通过。——第22頁。